

历史神话化的文本典范

——《世本·作篇》所载发明创造类神话蠡测

原 昊

摘要:《世本·作篇》记载大量上古发明创造神话,多将发明权赋予神话中的神,这是历史的神话化的典型和集中体现,其结果使得历史中的文化英雄和社会制度被神话化而纳入神话传说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上古发明创造历史的久远。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神话中体现出的文化自我意识。

关键词:《世本》;《作篇》;上古神话;历史神话化;神祇史观

中图分类号: I2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1)03-0069-04

中国上古发明创造类神话,也有学者称之为文化起源神话、自然社会性神话,是上古神话的重要类型之一。按照通行的现代文明史观,发明创造类神话应具体阐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器物、制度的建制及演进过程,其形式应如清代魏崧所编《一是纪始》描述的那样。然而上古先民处于文明演进过程的初始阶段,他们不自觉地将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发明、克服自然界障碍的功劳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或为神祇,或为神祇臣子)的身上,而这些思想落实下来,在文献上累积汇总,便造就了《世本·作篇》之类先秦文献。^①

长久以来,学界对神话的历史化问题有一定讨论,但对历史的神话化问题则关注较少,笔者以为先秦文献《世本·作篇》所记载的发明创造类神话,具有历史神话化的典型性和集中性,是先秦时期历史神话化的文本典范。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神话化与神话历史化实属两个阶段:神话历史化是神话解读过程中,人为地替神话传说找到在历史发展轨迹中的合理因素及轨迹,历史神话化与之相辅相成,但出发点是在神话起源问题上的探析,是人文因素渗透到神话发展过程之中。历史神话化,其方法是

把死去的历史人物(帝王和伟人)尊奉为神,其结果是缔造出许多神话英雄,神话英雄又被赋予各种制度、器物的发明权。历史的神话化在历史文献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把人类起源、人类远古时期的发明创造神话化,希腊神话中,将喇叭、长笛、壶罐、犁子、耙子的发明权归于雅典娜,罗马神话中,将小竖琴、管乐器、度量衡和拳击的发明权归于墨丘利。赵沛霖先生在其《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中认为,中国上古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历史神话化和神话历史化两个阶段,即人——神——人,历史——神话——历史,其脉络大体是:氏族和部族的祖先被神化而演变为祖先神乃至一般神祇,在后来的神话历史化思潮中,这些神祇又还原为氏族和部族的祖先或某些古国的明君贤相。本文所讨论的正是第一个阶段中,先秦文献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神话化现象。

一、《作篇》所载发明创造类神话的神祇史观表现

从黄帝到三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物质文明的创造高峰,其范围涉及到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音乐体育,从制度法则到原始科学。《世本·作篇》记载的发明创造包罗万象,计83项^②,如果将该篇当做技术辞典来看,则可将所载发明创造分为食用、制度、器物等12类,其中:食用类10项,衣着类7项,居住类3项,交通类7项,制度类7项,祭祀类3项,历算类7项,农业类2项,音乐类19项,卫体类6项,器物类10项,字画类

^① 关于《作篇》的成书年代,学界说法不一,笔者认为该篇主体的成书时间为战国时期。

收稿日期:2011-01-10

基金项目:本文为大庆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世本〉所载神话传说辑考》(项目编号:08SQ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原昊(1980—),吉林长春人,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上古神话传说。

^② 参见原昊、曹书杰《〈世本·作篇〉七种辑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5期

2项。发明创造神话中,各项的发明权则各有归属,但大体给了黄帝等神话时代的神祇及夏商周三代的帝王,具体的发明权分配为:燧人氏1项,伏羲氏5项,神农4项,黄帝及臣子29项,颛顼1项,尧7项,舜10项,夏代帝王11项,商代帝王3项,周代帝王12项。

按照《作篇》的说法,中国最初的制度、器物,由伏羲、神农、黄帝等神话中的神祇创造,又在上古帝王的革新以及随后其臣子的补充下,变得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作篇》集中体现的史观,类似汉代陆贾、王充等人的圣人史观^①,但在《作篇》中,圣人只有区区几个如鲁昭公、苏成公等现实人物,更多的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祇,故本文姑且称这种史观为“神祇史观”。《周礼·考工记》载:“知(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②此处记载仅笼统地说圣人或智者创物,而到《新语·道基》篇中,陆贾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历史的发展为历代三种圣人努力创造的结果,其中既有伏羲、神农等“先圣”,又有夏商周帝王等“中圣”,又有“后圣”孔子,《道基》也零散记载了一些上古时期的发明创造:“(神农)教人食五谷……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后稷)辟土殖谷……禹乃决江疏河……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③《新语·道基》篇中的记载与《作篇》所载的发明创造及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典籍所载上古帝王的功业相近,但《作篇》的编纂者似乎并不太重视“中圣”和“后圣”的发明,而更倾向远古传说时期的“先圣”,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先圣”绝大多数属于神话传说的谱系。

在对待发明创造归属何人时,先秦先民自觉运用了神祇史观思维,当然,这种运用有其合理性,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当一个民族“不再被封闭在直接欲望和需要的狭窄圈子内而开始追问事物的起源时,他所能发现的还仅仅是一种神话式的起源而非历史的起源。为了理解世界——物理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他不得不把它反映在神话时代的往事上”。^④神祇史观的运用不但合理,

而且有一定积极作用,在先秦时期,人类发展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此时百姓并不可以随意将所见所闻书于竹帛,他们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基本上通过口耳相授,将发明归于神祇、帝王,既便于记忆,又可以引起人们广泛而持久的注意^⑤,所以后人在叙述先世发明创造之时,总是习惯性地加以夸大,在添油加醋之余,还不忘把发明创造累积到个别神祇、帝王身上,这种累积的结果,最典型的就造就了无所不能、创制万物的黄帝^⑥。正如吕振羽先生的论述:“不创造一个具体的人来作代表,即以之和具体的人结合起来,对于邃古各时代的神话,是难于说明和传留的,尤其在人类还处在低级阶段的时代。”^⑦先秦典籍《山海经》也记载一些发明创造神话:番禺为舟、吉光为车、般为弓矢、晏龙为琴瑟、义均始为巧、帝俊子八人始为歌舞、叔均始作牛耕、叔均为田祖、河伯仆牛、太子长琴始作乐风、鼓延始为钟为乐风等等。但《山海经》的发明创造神话没有《作篇》记载丰富且有系统,而且《山海经》的神祇史观表现为把发明创造多归附于帝俊和颛顼,这与《作篇》把发明创造多归于黄帝不同,属于两个体系。

二、《作篇》将发明创造历史进行神话化的三种结果

《世本·作篇》把发明创造的历史进行了神话化,使得历史中的文化英雄和社会制度被神话化而纳入神话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上古发明创造历史的久远,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种结果,文化英雄被神话化。上古发明创造的历史被神话化,方法有二,归于神祇或归于典籍。第一种方法是像《作篇》一样,将发明创制归于诸位神话英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黄帝无穷的智慧和神力,以及对社会发展而起到的重大推动作用,井、火食、甲子、历算、磐等都由黄帝自创或授意臣子创制。黄帝成为神祇较晚,但却后来居上、声名显赫,这与《作篇》的汇集和依附有极大的关系。齐思和先生曾指出:

黄帝之成为人王也,虽时代较晚,而后来

① 圣人史观,又有圣贤史观、英雄史观(西方学说)等别称,汉代陆贾《新语·道基》中说上古时期的制度器物“圣人成之”、“贤者建功”,王充《论衡·对作》进一步论述为“圣人作,贤者述”,“作”为创造、创作之意,“述”是说包括陆贾、王充在内的贤人记录并发展圣人的创造,以此循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
②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5-906页
③ 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4页
④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第219页

⑤ 这与中国古代行业神崇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代行业神崇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神自重,从业者借奉远古神祇或帝王将相以引人注意和尊敬,尽管这样做不一定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但往往使得从业者得到慰藉和寄托。
⑥ 中国古代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信仰的对象人鬼化,在民间形形色色的城隍形象特别是人鬼形象最具有代表性,这种文明社会的惯性信仰应该是受了邃古之初神祇史观思维的影响。
⑦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5页

居上，其声势之显赫，传说之复杂，则为三皇五帝之最。古史传说，至战国末年，既集中于黄帝其制器故事，自亦较其他传说之帝王为多。故《世本》所举伏羲、神农、尧舜之发明，不过琴瑟棋箫数事而已。至若火食、旃、冕，制乐等重要制作，皆归于黄帝，不惟使重要之发明归之于黄帝已也，更要以重要之发明家，为黄帝之臣。^①

黄帝原来很可能是人王或祖先，后来不同的部族为了“宠神其祖”故以“帝”号之，这个把祖先或先王神话的过程自殷商时期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兴盛，《世本·帝系》及《国语·鲁语》^②中的神话谱系是明证，到《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已定型化。《作篇》中文化英雄的制作故事被引向宇宙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端，内容完整详实，且颇具政治神话的意味，到了汉代《礼纬·含文嘉》《礼纬·稽命征》《易纬·乾凿度》《春秋纬·春秋内事》等诸多纬书中，三皇五帝发明制作的故事更加详尽、更加完整，俨然成为一个政治神话系统，这应该是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有些被归为黄帝臣子的发明并非出自《作篇》正文，而是汉魏时期的宋衷、宋均的注释，齐思和先生《黄帝之制器故事》指出宋衷常常将考证不清的人归为黄帝，而宋均的注释中也存在同样的毛病，对二人的注释不能盲从，需要仔细辩驳。

上古发明创造历史被神话化的第二种方法是将思想源头归于典籍，这方面的任务，由《周易·系辞》完成，故我们看到在《系辞传》里，诸项发明创造都受《周易》思想启发，都由易象引申而来，如“舟楫之利，盖取诸《涣》”，涣卦的卦象为巽上坎下，即木在水上，故《易》言舟楫是在此思想启发下而被创造出来。《系辞传》虽提到了黄帝、尧，但绝大多数发明并不言具体的发明者，笔者认为这是儒家旨在宣扬易象的无穷功用，如《系辞传》“（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强调的就是伏羲造八卦具有垂教天下、示范百代的作用，清人皮锡瑞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其《经学通论·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一文中，提出《周易》所言发明意在“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皮氏还认为《周易》所言伏羲画八卦的目的，是为了立五常、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在此基础上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可以说皮锡瑞抓住了《易》

垂教的本意，这正是孔夫子所言“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③的根本原因。

而从这个角度上考察，《作篇》又一个价值便凸显出来，即该篇却保存了一些不尽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发明神话，如“蚩尤作兵”。儒家的观点认为不是圣王不能创制，正如《大戴礼·用兵》所记载的孔子的话：“公曰：‘蚩尤作兵与？’孔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愎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④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一书也极少论及鬼神，此处孔子对神话传说中蚩尤的兵器发明权提出否定，缘由在于蚩尤极端残暴、贪婪。《吕氏春秋·荡兵》也有类似记载：“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高诱注中则进一步阐释，说蚩尤“始作乱，伐无罪，杀无辜，善用兵，为之无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⑤笔者认为，蚩尤作兵之说，在先秦时期确实较为普及，可能源于当时流传的蚩尤在战争中大显神威的神话，《作篇》此条记载应真实记录了先秦民众对兵器的畏惧及对战争的诅咒思想，从史料保存的角度，没有经过孔子等精英历史化改造。

还需注意的是，兵器创制问题上，《作篇》除了把整个兵器的发明权给了蚩尤之外，具体兵器如弓、矢的发明则另归他人，这又体现出当时确实有多种版本的发明创造神话，《作篇》汇集诸多版本的口头传说，又进行调和。这种调和，在《作篇》本文中还能找到旁证，最类似的是既言“夔作乐”，而琴、瑟、笙等具体的乐器又各有发明者。这种调和还有：火的发明权既给了燧人又给了黄帝，井的发明权既给了黄帝又给了化益，酒的发明权既给了杜康又给了少康，既有伯余作衣又有胡曹作衣，既有陶制五刑又有伯夷作五刑，既有汤作五祀又有微作禘五祀，既有常仪占月又有羲和作占月，既有咎繇作耒耜又有垂作耒耜。有学者对此类记载颇多微词，认为这种同一典籍所载同一器物却有多多个发明者，属于胡编滥造，有学者甚至将同一器物却有多多个发明者解释成反映了器物是上古人民集体劳动成果的事实^⑥，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真实记录社会历史的史料，尽管有些类似资料汇编，但上古时期口口相传中自然多有端绪，真实著录下来，才能让我们从纷繁琐碎的上古发明创造神话中看到经儒家典籍有所删削

① 顾颉刚等《古史辨》（第七册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② 《国语·鲁语》中记载展禽列述柱、弃、共工、后土、黄帝、颛顼、帝喾等祭祀形式，其整齐的祭祀谱系一目了然。

③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482页

④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9-210页

⑤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页

⑥ 见郭天祥先生《〈世本·作篇〉发微》及刘城淮先生《中国上古神话》。

的历史记忆。《国语·楚语》记载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说明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士人纷纷著书立说，汇总梳理古史旧事，《作篇》的编纂者也应在此风潮影响之下，将多有端绪的创制记录下来，除了上文讨论的蚩尤神话之外，齐思和先生《黄帝之制器故事》中还发现围棋、箫、笙簧、屣履等物的创造独见于《作篇》，而不见于其他典籍，这也是《作篇》在史料保存方面的价值所在。

第二种结果，社会制度被神话化。《作篇》将社会分工的历史也神话化，如“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夷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黄帝使伶伦造磬，垂作钟，沮诵苍颉作书，史皇作图。”这些颇似后世社会分工的理念，在《作篇》中被归于神话人物且极有条理，这倒是有些有意为之的迹象，其用意或欲推前制度的创立，或欲提高神祇的神威。两个“使”字，郭天祥先生提出疑问：“试想，一种事物在未发明以前，本属未知，怎么可能由贤者神话传说中的神祇委派专人去创造呢？”^①此问恰中要害，很有启发性。需要注意的是，前条引文中分别见于清人雷学淇、张澍两家辑本，辑自《史记·历书索隐》，他书所辑或无“黄帝使”，或作“羲和作占日”，这使得此条记载疑团颇多，如言“羲和作占日”，意思是发明，如言“黄帝使”，意为受派遣，这两个意思相差甚远。核之今本《史记索隐》有“黄帝使”，且《春秋序》孔疏、《文选·西京赋》李善注皆引此文，而未全，故此条创制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且这种社会分工理念也较为粗疏，行业观念尚未成熟，所创制的神也属全民性的创始神。

第三种结果，低估了上古发明创造历史的久远。《作篇》载“挥作弓”、“夷牟作矢”，宋衷注说挥和夷牟都为黄帝臣子，这就是说弓矢的发明在黄帝时代。然而核之考古发现，虽难以见到石器时代的弓和箭杆，但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箭簇却十分丰富，山西省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个用很薄的隧石片打制的石簇，其形状也较规整，据C-14测定距今28945年，^②这证实中国使用弓矢的历史距今至少已三万年，而把弓矢的发明历史追溯至神话人物黄帝的臣子，因东夷而言夷牟，虽较为贴切，但其创制年限却推迟了很多年，《作篇》将此器物创制归入黄帝神话系统而实属低估的例证。

三、历史·传说·历史记忆——《作篇》历史神话化的价值

《世本·作篇》所载，可能都是一些传说，不尽可信，故很多人认为《作篇》沿袭中国人传统思维，将发明创造归为神话中的远祖的做法荒谬甚至可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名字未必准确，但我国上古先民确实发明了这些东西，《作篇》记载的大部分的神祇英雄，其中虽不乏条理化的痕迹，但毕竟可以使我们窥测到远古发明创造神话的归属，这种归属中存在一种暗示，即使其人不是伏羲、黄帝，但也暗示了在某个时代，诞生了形态原始的中国文明。我们也主张这些发明都是由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经过摸索创造出来，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而非神话传说中的神祇创造的。但我们也该认识到任何一种创造都只能是少数人的，不可能一大批人同时发现一种事物、提出一个理论。更不能断然否定少数推动历史发展的智者，正如田边尚雄先生所论：“所谓伏羲氏发明琴瑟者，即中国民族对于乐器之一理想，付与理想的人物伏羲氏也”^③。把个人或群体的发明神话化而归于神祇，与此同时抽象化而归于帝王及臣子，这两个步骤在《作篇》中同时完成，也正是典型的历史的神话化。在这个层面上，《作篇》虽然夸大附会，但也较好地完成了其任务。

认识到《作篇》所载的神祇、帝王是历史人物经过神话化成为神话符号，我们则应该剥开神话化了的历史，而将神话符号还原为人物符号，如把燧人氏、伏羲氏等当成上古时代符号，把蚩尤、昆吾等当成上古氏族符号，把黄帝、尧等当成氏族首领符号，把巫咸、巫彭等当成上古职官符号，那么，我们会很好地通过这些符号来捕捉这些只言片语的发明创造神话所蕴含的史影。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言：“然黄帝时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故知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而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著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物成务，为一人一家之绩也。”^④从名号上看来，《作篇》所载文明制作者有的是来自神话传说中的神祇（如黄帝及其臣子），有的名号是后人根据某种已形成的文化意象而追加的（如燧人氏、神农氏），但这并不妨碍其历史真实性，把他们理解为上古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农具研制、渔猎活动、乐器发明、历法创制的符号化，则其名号正是真实史影的烙印。赵世瑜先生所言极是：“事实上，无论（下转第50页）”

① 郭天祥：《世本·作篇》发微，《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速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③（日）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2页。

④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14页。

‘精通乎天地，神履乎宇宙。’此之谓神之履也。”

按：覆，意即伏。《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门而覆山下，大败之。”杜预注：“覆，设伏兵而待之。”《吴子·治兵》：“常令有余，备敌覆我。”此言威势散发，必须要神伏于其中。陶、尹说未尽其旨，俞说非。

39、神之使

《本经阴符七术》“散势法鸢鸟”：“散势者，神之使也。”

神之使，陶弘景注曰：“势由神发，故势者神之使。”

按：使，支使、出使，此处意为出。《管子·枢言》：“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上文“分威”乃神之伏，此言“散势”乃神之主，正相对文。

40、损兑

《本经阴符七术》“损兑法灵蓍”：“损兑法灵蓍。”

损兑，陶弘景注曰：“《老子》曰：‘塞其兑。’河上公曰：‘兑，目也。’《庄子》曰：‘心有眼。’然则兑者，谓以心眼察理也。损者，谓减损他虑，专以心察也。兑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损兑法灵蓍也。”高金体曰：“损者，减也；兑者，言也。灵蓍不言，而为是非之决；圣人不言，而为是非之准。”

俞樾曰：“从下文曰‘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疑此文亦当作损益。揲蓍求数，有多有少，故曰损兑法灵蓍也。下文曰：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兑亦当作益，知贵乎博，为学日益之事，故曰益者，知之也。行贵乎约，为道日损之事，故曰损者，行之也。若作兑字，义皆不可通矣。”尹桐阳曰：“损同运，行也。兑即駢，马行疾来貌。”俞樾曰：“兑者，说也。”萧登福曰：“兑是悦的意思。《释名·释天》说：‘兑，说也。物皆备足皆喜悦也。’”

按：兑，直。《诗·大雅·皇矣》：“松柏斯兑。”损兑意即关键时刻，需要减损行事，直接凭判断出手，不能犹豫。蓍，蓍草，形状为直，蓍草折断则不灵，故曰“损兑法灵蓍”也。“分威”与“散势”相对，“转圆”与“损直”也相对。下文云“损兑者，机危之决也”，“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则损兑是在危急时刻采用的做法。诸说皆非是。

41、相须

《中经》：“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

相须，尹桐阳曰：“须同胥，相胥，相助也。”

按：须，即需。须、需均为心母侯部，为同源字。《论衡·效力》：“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相须即相互需要彼此之间的配合。尹说非是。

（责任编辑：黄云鹤）

（上接第72页）

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将两者对接起来，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①李零先生《中国方术考》论及秦汉文献署名作者和实际作者不同的问题时，提出“依托”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概念和术语。“应说明的是，它并不等于后世辨伪学家所说的‘伪造’，而是各种实用书籍追溯其职业传统的一种特殊表达，就像木匠要自称是出于‘鲁班门下’。”^②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论述也可运用于对《作篇》发明创造神话思想的解读。

《作篇》的发明创造类神话，是历史的神话化，

体现出古代先民的神祇史观，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神话中体现的先民的文化自我意识。陈来先生的论断很精辟：“在早期文化发展时代，人们认为火、工具、医药、文字的发明不是靠人的力量 and 智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神灵赐给人们的赠品。文明被看做从神灵手中接受来的东西，而不是人所创造的产物。但文化神话中的文化英雄，作为人的力量的一种投射，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的力 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力量的确信。”^③《作篇》所载黄帝等神祇的发明，是正在觉醒的文化自我意识的具体的神话表现。

（责任编辑：闫丽）

① 赵世瑜：历史·传说·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② 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③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4-105页。